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新解

Theory of Marxist Social Development

A New Perspective

[美] 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 著

张秀琴 等 / 译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新解

Theory of Marxist Social Development

A New Perspective

藏书

[美] 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 著

张秀琴 等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新解 / (美) 罗伯特·布伦纳著; 张秀琴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0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ISBN 978-7-300-23410-6

I. ①马… II. ①罗…②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IV. ①A81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0406 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新解

[美] 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著

张秀琴等译

Makesi Shehui Fazhan Lilun Xinji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25.25 插页 3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33 000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委会

顾 问 徐崇温 贾高建 顾海良 李景源 陈学明
欧阳康 高宣扬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 编 杨金海

副主编 贺耀敏 冯 雷 鲁 路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曹荣湘 成 龙 段忠桥 韩立新
黄晓武 江 洋 靳书君 孔明安 李百玲
李惠斌 李 玲 李义天 李永杰 梁树发
林进平 刘仁胜 刘元琪 陆 俊 鲁克俭
聂锦芳 万资姿 王凤才 王虎学 王 杰
王治河 魏小萍 徐俊忠 杨学功 姚 颖
于向东 臧峰宇 曾枝盛 张 亮 张廷国
张 彤 郑吉伟 郑天喆 郑一明 周文华

总 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问世已逾十五个春秋，出版著作数十种，应当说它已经成为新世纪我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翻译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大型丛书。为适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迫切需要，我们将继续加大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力度。

“译丛”在不断成长壮大，但初衷未改，其直接目的是为国内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翻译介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升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并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包括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话语体系等；而根本目的是借鉴当今世界最新文明成果以提高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乃至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译丛”的鲜明特征是与时俱进。它站在巨人的肩上不断前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翻译介绍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特别是徐崇温先生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等，将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介绍到国内，对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转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套丛书的使命，就是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跟踪研究，尽快把这些新的思想成果介绍到国内，为人们研究有关问题提供参考。

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世界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指自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学者通常指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的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实践上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深远。仅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其影响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体系。如“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第二，它影响并带动了世界上大批著名学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正是这些思想家在引领世界思想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第四，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第五，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大众语言、生活节日，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局面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局面下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20 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形成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世界马克思主义形态纷繁多样，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指向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大潮中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好方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大国，认真研究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全球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都在不断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人类

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世界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一轮发展，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机遇。同时，也应当看到，尽管今天的世界是“一球两制”，但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尚未到来。时代的深刻变化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比如，究竟应如何定义今天的时代？对此，国外学者给出了各种答案，诸如“全球化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等。又如，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由此引发一系列全人类性的问题。如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国际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世界体系重构、全球治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普遍爆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又重新焕发生机，并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引发世界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特别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的研究仍然是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国外学者所做出的回答，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了解这些思想潮流，有助于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问題。

从中国现实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不断推出。随着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交相辉映，这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面临各种困难与问题、风险与挑战，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为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要把这些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变为现实，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再者，我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国际

话语权还很小，这是制约我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必须在未来世界文明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要解决好自己发展问题，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这就需要站在世界潮流的高度看问题，特别是要把握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做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准备，又要培养担当精神，主动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文明对资本主义旧文明的超越，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而要赢得世界的话语权，乃至引领世界文明潮流，就需要认真总结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高度，形成一套现代化的国内外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使之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领域、教学教材体系乃至变成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

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学者，要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时代性、创造性、权威性、建设性的作品，译介给我国读者。这应当说是“译丛”选题的基本原则。

至于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的翻译引进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的研究。二是有关重大问题研究成果，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方面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走向、人类文明转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有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人的发展问题、共享发展问题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回答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四是海外有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

的研究。这是近些年来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新亮点，也应当成为我们这套丛书的新亮点。翻译介绍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鉴，提升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其他凡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也都在选题之列。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国外学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为更好地完成丛书的使命，我们充实调整了顾问与编委队伍。邀请国内著名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作为丛书顾问，同时，邀请国内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委，还适当吸收了青年学者。这些学者，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或对某一领域、学派、人物等有专门研究，或对国内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权威性。有这样一支语种齐全、研究面广、代表性强的老中青队伍，加之广大学者的积极支持，我们有信心把丛书做得更好。

“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新作列入丛书。为此，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和参与丛书工作的朋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有考虑不周或疏漏乃至失误之处，也请大家鉴谅。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为丛书推荐书稿、译者，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

杨金海

2016年6月16日

于北京西单

目 录

第一章	马克思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第一种模式	1
一	一般理论	2
二	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	8
三	结论	20
第二章	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对“新斯密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28
一	引论	29
二	亚当·斯密和经济发展的阶级基础	35
三	斯威齐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42
四	沃勒斯坦和现代世界经济	52
五	经济发展和欠发展的阶级结构	65
六	资本主义的起源	73
七	“欠发展的发展”	77
八	结论	83
第三章	财产权及其进程：亚当·斯密错在哪里？	96
一	非历史的唯物主义	96
二	斯密的决定性贡献及其批评	101
三	走向一种关于经济发展的历史理论	104
四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演变	106
五	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	120
六	结论：比较视野下的经济发展模式	136
第四章	世界体系理论与资本主义过渡：历史和理论的视角	144
一	引论	144
二	中世纪的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151

三	现代世界体系	155
四	从历史角度看 16、17 世纪的世界经济	160
第五章	从理论到历史：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171
一	简介：曼恩的后现代启蒙观	171
二	从反整体论到“欧洲奇迹”？	173
三	社会权力网络或社会财产关系？	182
四	结论	201
第六章	欧洲前工业化时代的农业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	211
一	人口论模式	213
二	商业化模式	220
三	阶级冲突和经济发展	223
第七章	欧洲资本主义的农业根源	254
一	导论	254
二	人口论模式和阶级关系	257
三	阶级结构、阶级组织以及中世纪欧洲封建主义的发展	263
四	封建危机的后果及其后的发展模式	290
第八章	资产阶级革命和向资本主义过渡	343
一	345
二	349
三	352
四	358
五	363
第九章	1550—1650 年英国商业扩张的社会基础	368
一	369
二	371
三	376
四	380
译后记	390

第一章

马克思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第一种模式*

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马克思先后提供了两种解释模式。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它们混淆在一起、不加以区分。但它们之间却有着本质性区别，即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种模式出现在马克思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和《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1847）中，并在《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中得到了重要的纲领性呈现。这一解释模式的核心就是自我发展的分工概念。以此为出发点，该模式认为，分工直接代表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它应市场的扩张而变，并继而决定了社会财产^①和阶级关系。根据该模式的基本描述，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指的是一个发展中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成熟：它发源于旧封建社会内部，并从不断发展的世界贸易中汲取营养。该模式的最终落脚点是资产阶级革命，即认为通过这一革命进程，新兴资产阶级社会打破了旧社会的束缚，从而为其持久的自我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种模式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The Grundrisse*, 1857—1858）、《资本论》（*Capital*, 1867—1883）及其他一些晚期著作中，但却从未得到马克思的充分完善。其指导原则是生产方式论，即认为生产方式是一种社会财产关系系统，该系统形成并建构了社会再生产——尤其是个体家庭的延续和阶级的构成。基于这种生产方式论所提出的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模式，是从具有冲突性的再生产开始的，即一方面是农民生

* 本文系将要发表的一篇长文的第一部分。

① 这里说的“财产”即“property”，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相关内容大多翻译成“所有制”（参见下文相关引文内容），本书中则多翻译成“财产”（有时为行文方便也译成“财产权”或“所有制”），鉴于本书作者布伦纳教授所提出的“社会财产关系”理论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这里特作说明。——译者注

生产者阶级直接通过非市场化渠道拥有其自身再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则是地主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借助于超经济强制性手段从农民生产者身上榨取剩余以进行其自身再生产。该模式的最终目的旨在解释“所谓的原始积累”，从这一视角来看，后者指的是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财产关系被封建社会本身的行为所打破和改造的系列社会进程。

本文旨在澄清马克思的这两种过渡模式及其影响。我要表明的是，第一种模式源于一种“启蒙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说来，它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所提出的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经典解释非常类似，尽管它也以补充的方式援引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保守的唯物主义史学。由于对斯密式概念的依赖，该模式无法恰当地提出过渡问题，而是在关键时刻以过渡解释过渡，特别是以类资本主义机制和结构的萌芽式存在来解释资本主义本身的出现。其所导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就是，虽然它似乎把阶级斗争（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置于历史转型的关键位置，但却使阶级斗争丧失了任何实际意义。

与此相关，我还要揭示的是，马克思基于其生产方式概念而提出的第二种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过渡模式，这才真正使我们能够以一种空前犀利的方式提出过渡问题。可如此一来，马克思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格外艰巨的现实和历史任务，即封建地主和农民缘何正是在封建式的（作为封建阶级的）自身再生产过程之中导致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封建财产关系的转型。在我看来，要面对这个马克思很少提及且从未解决的难题，就必须深刻理解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和变革中的作用。

一 一般理论

马克思最初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主要呈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其立足点就是该文献中明确阐述的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即一个民族生产生活资料的方式、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也就是说他们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他们是什么样的民族，因此，社会演变的关键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因为这是生活资料的生产（生存方式）不断变革的深层原因，而生产力的发展则体现在分工的发展中。“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增加（例如开垦新的土地）。”^[1]

马克思认为，分工的发展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专门化，即先前在同

一个生产单位或部门进行的生产活动被划分到不同的单位或部门。理由是专门化生产效率更高、更多产。最初和最典型的专门化，是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在马克思看来，商业与工业的分离，以及复杂的手艺被分解成简单的生产流程，凸显的是分工的进一步发展。^[2]

分工发展的第二个方面涉及单位内部的直接生产组织，因为劳动过程不是以交换和市场为媒介的。这在技术上也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3]

最后，正如生产力的发展（借助于同时决定单位和部门的不断专门化以及劳动过程的变革）引起分工的发展一样，分工也通过引起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进一步分离决定了阶级的演变，因此，每一种合作方式都带有其具体的脑一体、知一行分离形式。对于马克思来说，正是这一最具有根本性的分离，决定了阶级和更一般性的财产关系。“各个团体（在合作中）的位置，取决于生产的组织方式”。继而，“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因此，大致说来，父权制产生于所有生产任务都集中在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最初原始生产阶段，而师傅对学徒的统治则产生于行会内部的手工业作坊式生产等。于是就可以理解：“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4]

我们由此发现，在马克思的上述第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构想中，生存方式决定了社会存在的本质，而生产力发展水平则又决定了生存方式。历史的沿革继而所遵循的是一种明显的决定论。生产力水平本身的不断提高，体现在不断发展的分工上，即日益专门化和合作方式的革新（都可理解为生产的技术性需求反映）。每一种合作方式都决定了一种具体的脑体分工，而生产单位内部的脑体分工则最终决定了整个社会的阶级本质。财产形式仅仅是阶级本质的一种具体表现，因为它是由生产者之间的关系（鉴于他们各自与劳动资料、工具和产品的不同结合方式）所规定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因果链：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发展（专门化与合作）→脑体分工形式→阶级和财产关系（劳动资料、工具和产品的分配）。

一个初始性难题^[5]

我们或许马上就会发现，这一进程的立足点是一系列的相关假设，即

假设：(1) 生产力（在技术进步的意义上）一直会发展；(2) 新的生产力会被广泛采用；(3) 随着新生产力的普遍采纳，阶级—财产结构将发生相应转型。当然，类似的过程的确会在既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经常发生，但那是因为既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必然会存在特定的具体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人能够直接占有其自身的再生产资料，换句话说，没有人拥有足以使其自身生产所有生存必需品的全部或大部分原材料、工具和劳动力，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购买大部分生活必需品，而为了能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他们不仅要有东西可卖，而且还要能“在市场上”把东西实际卖出去。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必须进行交换型生产（因为他们没有生存型生产所需要的资料），还必须能够有“竞争力”地开展生产，因为每个人都在“为交换”而生产。^[6]

在这种既有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进程的确会发生。因为一方面，为确保交换型生产的持续性和提高竞争力，每个人都会积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另一方面，一种强大的自然选择机制也会确保先进技术的普及，即生产者必须采用最好的技术才能有市场竞争力，否则他们就只能出局。鉴于某些附加但却不无道理的假设，我们可以进一步预见，小个体经营者最终将在竞争中输给使用雇佣劳动的大生产者。资本家将会因其高效率而在与小生产者的竞争斗争中获得成功，所以，生产力不仅会得到发展，而且最先进的生产力还会被引进和推广。最后，这一过程会导致阶级—财产关系的适时转型。^[7]

但假设生产不以交换为目的，也不具有竞争性，尤其是假设生产者拥有开展其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全部或大部分原材料、工具和劳动力，而且这些再生产资料具有不可剥夺性。换句话说，假设（展望未来）人们获得了再生产资料占有权或财产权，在这种情况下，首先，他们从事与生产资料（如与发动战争的资料相对）有关的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可能会相对降低；其次，他们可能会发现由于种种原因而难以实施创新，而且，即使此时他们的对手真的实施了创新，他们也未必会跟进，因为他们不是为了交换而生产，也就不需要为了生存而参与市场竞争，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用来淘汰那些未能实现“社会必要”率的生产者）的自然选择机制了。在此条件下，生产力也许就不会发展，且即使在一些生产单位中有所发展，先进技术也不会借此全面推广开来。旧的财产结构可能会最终得以实际保存，或者是允许截然不同水平的生产同时并存，甚至是阻止新生产力的广泛采用，因此，是生产力被迫适应财产系统，而非财产系统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并未直面这一难题。但无论如何，他的确（以某种方式）在讨论历史的个体化趋势时至少含蓄地涉及了这一问题。马克思认为，家庭及其“倍数”形式亦即部落是最初的分工形式，在整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一直都借此获得生活资料。与家庭一部落式原始分工相对应的阶级和财产关系是父权制和公社所有制。部落作为公社把持着财产权；父亲或长辈作为个体或集体决定家庭或部落中的分工，并不成比例地从中获益。即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从狩猎和采集，经游牧生活直至发展到定居农业阶段，他们的生产力依然表现为家庭一部落制分工以及相应的家长制和公社所有制。第一个完整形态的阶级结构——奴隶制，则源于家长制和部落间的战争。但马克思却强调，表现为家长制和公社所有制的部落集体为宗法式奴隶制提供了持续的必要基础。^[8]

与家庭一部落式分工和立足于公社所有制的奴隶制的首次根本性打破相伴随的是城邦的兴起。城邦的兴起“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不过它继而也完成了一场革命，即交换、部落间和部落内部的专门化、个人私有财产（动产和不动产）等的关联性发展，最终导致了城乡分工。^[9]可关于这一过程的本质，马克思的论述却语焉不详，似乎包含着两种可能性解释。^[10]

根据第一种解释，人口是变革的原动力。^[11]人口的增长导致人口密度的增加并继而带来了自然资源压力。其所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加剧了部落内部的阶级分化和剥削，特别是奴隶制的发展和奴隶受压迫程度的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则扩展了部落的领土统治，即战争和征服导致一个部落对其他部落的统治，因此，为应对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资源压力，部落开始对内把资源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统治者手中，对外则把资源从被征服者手中转移到征服者手中。总之，以各种方式加强阶级统治和剥削。

这样的发展肯定已大量发生，但却不能用来解释财产形式和生产力的质的转变。马克思将其与古代城邦的兴起联系在一起，且马克思是否认为它们能导致财产形式的质变尚不确定。因此，一方面，即使我们和马克思一样假设部落首领有可能巩固和加强奴隶制，那也只能是对建立在部落一公社所有制和宗法奴隶制基础上的原有制度的延续。同样，即使我们假设一个部落有可能通过征服而控制另一个部落，那也只是对原有部落形式的一种新组合，而非与其决裂。另一方面，假设出现相反的结果，即奴隶反抗使阶级剥削无法加剧，附近部落的成功防御也使征服失去了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部落仍会通过削减物品向首领的流动，即通过减少阶级分化和剥削来应对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然而，该结果又一次只能是旧结构内

部量的调整，而不构成一种变革。

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推动个体化进程的显然是交换以及与之相关的专门化的发展。开启公社或部落所有制解体进程的部落间的物—物交换，并没有太多的冲突。这种原始的交换在每一个参与交易的部落内部都对应一种最初的专门化。继而以外部交换为目的的专门化则带来了划时代的发展，即私有制的出现（并不普遍）——最初表现为动产的形式（交换资料）。而与最初的部落间的专门化的密切结合则首次出现了（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在内的）普遍形式的私有制（大概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是为了在部落间进行商品交换）。

上述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造成了立足于交换型生产（也就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的个人私有制的出现。正是这个最初导致私有制产生的进程（以交换为目的的专门化），使基于私有制的生产一开始就依赖于交换和分工。于是就可以理解，沿着这一指向个体化（也就是私有制是交换型生产的基础）的最初突破，接下来就应该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交换刺激下的城乡分工的出现，生产与贸易的分离，以及最终财产的集中和劳动力的（局部的）无产化……一种迈向（尽管尚未完全实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的运动。^[12]

于是马克思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概括了由交换和分工所导致的从部落—公社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个体化进程。根据这一概括，公社所有制中没有任何贸易或分工，它是自给自足的。与此相反，私有制一开始就是以分工为前提的，所以不可能是自给自足的。基于私有制的生产者也就可想而知必须参与交换和竞争了，而交换的深入发展则会导致分工和个体化的进一步加剧，并决定了迈向资本主义的运动趋势。这一过程可图示如下：公社社会→不同社会间的交换和专门化→基于动产和不动产私有制的交换型生产→不断扩大的分工和专门化→(?)资本主义。原始的公社所有制可以说是因贸易和专门化而从外部被瓦解的，它产生了基于分工的私有制，这种私有制又在交换的影响下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但很明显，马克思的个体化进程论仅仅是巧妙地处理了我前面提到的难题。但问题的要害在于解释：为什么在既定的交换型生产，即市场导向型竞争性生产之外，生产力的提高（包括新的专门化）会经常发生，为什么一旦发生了就会被整个经济所普遍采用，为什么它会带来所有制，即财产形式的变化。因此，在由城邦的兴起所导致的突破性进程中，马克思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简单的物—物交换就可以引起专门化，即使如此它又为何会被进一步推广，即普及，尤其是为什么一个部落旨在交换而扩大的专